# 南京的恶魔

（英）海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3314

Mo Hayder
The Devil of Nanking

根据 Bantam Books 2009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的恶魔/(英)海德著;刘春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036-5

Ⅰ.①南… Ⅱ.①海… ②刘…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663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5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36-5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　言

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南京

有人一谈迷信就怒火难遏，坚决反对，对这些人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自负轻狂到对多少年来的传统不屑一顾？当田间的老农告诉你古代中国的莽莽青山是因为天神发怒而被毁掉，几千年前的天空曾经被撕裂过，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平衡，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你难道比他聪明很多吗？你难道比他们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智慧还要高明吗？

我信。没错，最后，我信他了。我颤抖着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真的相信。我相信所有迷信里说的故事。为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世界上的奇异之事，也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解释这个灾难。因此我向民间传说寻求慰藉。当田间老农说大地向东倾斜是因为天神发怒的缘故，我相信。没错，当他告诉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河流、泥土和城镇，最终都必将滑向大海时，我相信。南京也一样，有一天南京也会滑向大海，消失在大海中。南京滑向大海的过程也许是最缓慢的，因为它已经迥然不同于其他城市。那些最后的日子使它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我们无法辨认的模样。当它开始移动的时候就会非常缓慢了，因为它那些未被埋葬的民众和游荡的亡灵会把它紧紧拴在大陆上，那些亡灵会一直追它追到岸边把它拉回来。

我也许真应该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能够看到南京现在的样子。我的目光从这扇狭小的窗子凝神望去，穿过露台便看到日本人留给南京的伤痛：黑乎乎的建筑、空荡荡的街道，水渠和河道中堆积着成堆的尸体。我低头看着颤抖的双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血现在已

经干了。如果我搓搓手掌的话，血痂会一片片掉落。黑色的血垢散落在纸上，颜色比我写下的字还要黑，因为我用的墨水比较稀薄。松烟墨汁已经用完了，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更没有意愿到外面再买些回来。

要是我把笔放下，斜倚在冷冷的墙面上，把鼻子挤到百叶窗前，姿态笨拙地向外眺望，我就会看到白雪覆盖的紫金山，它遥然矗立在一片破败的屋顶之上。但我不会这样做。我根本没有必要让我的身体摆出那么不自然的姿态，因为我永远也不想再看紫金山一眼。这篇日记写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回忆那一幕了：在紫金山的山坡上，一个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的中国人，穿过冰冷刺骨的溪水，迎着随风飘舞的雪花，像狼一样不顾一切地追踪那个日本兵……

追踪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我才赶上他。我们在离中山陵大门不远的一个小树林里，他站在一棵树旁，背对着我。树枝上融化的雪水滴落到他的肩膀上。他的头微微前倾，凝望着前面的树林，因为山坡依然是比较危险的地方。电影摄影机在他身边荡来荡去。

我在山中苦追了他那么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冰冷的空气使我的肺部一阵阵刺痛。我慢慢朝他走去。现在我都无法想象我当时怎么会那么平静，其实我全身都在瑟瑟发抖。他听到声音便猛地转过身，本能地蹲伏下来。不过我也算不上什么男子汉，身体也不强壮，比他还要矮一头。当他看到是我，也放松了一些。他慢慢地直起身子，看着我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俩仅有几步之遥。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我不会伤害你，”他说话的声音中似乎带着一丝怜悯，“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抱歉，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你能理解我这个日本人吗？”

“我能理解。”

他叹了口气，用戴着裂了纹的猪皮手套的手挠了挠前额。“这根本不是我希望的，从来都不是。请相信这一点。”他抬了抬手，大致指向灵谷寺的方向。“一点没错——他很享受这些。他一直都是这样。可我不是。他看着他们。他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拍成电影，不过我从中得不

到任何乐趣。请一定相信我，我一点乐趣都没有。”

我用袖子擦了擦脸，把眼泪擦抹干净。我朝他走过去，把颤抖的手放在他的肩头。他没有退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细细地看着我的脸，有些迷茫。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害怕的表情：他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我手里藏着一把水果刀。

“把摄影机给我。”我说。

“不给。你不要以为我拍这些电影是为了取悦他们，取悦那些士兵。我有比这更宏大的意图。”

“把摄影机给我。”

他摇了摇头。“绝对不行。”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周围世界的运动似乎突然之间慢了下来。在远处的山坡下，日本山炮正在发射猛烈的炮火，要把变节的民族主义者们赶出大山。日本兵对他们围追堵截，意在迫使他们回到城里。可是在山坡的高处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能听到的只有我们的心跳声，以及旁边树上冰雪融化的声音。

“我告诉你把摄影机给我。”

“我说了不给。绝对不给。”

我张开嘴巴，往前斜了斜身子，直冲着他的嘴发出一声号叫。我穿越雪地一路追踪他时这声音就在我胸中酝酿，现在我终于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呼喊出来。我猛然向前，旋转着把刀子刺透了他土黄色的军装，硬生生刺透了他佩戴的“千人针”[①]，刺入他的身体。他一声都没吭，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脑袋猛地一抬，军帽跌落下来。惊恐之中，我们两人都跌跌撞撞地退了一步，他瞪着眼看着我所做的一切。大团大团的鲜血汩汩地流到雪地上，内脏像奶油似的透过军服被撕裂的地方流淌出来。他瞪着眼看着，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后他才

① 日本人的一种迷信品，在一块布上由一千个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保平安。在日本，男子参军前，家中的女性会为其缝制这样一条腰带，围在腰上，按日本的风俗，传说这样的腰带能保佑平安，把这样的腰带围在腰间，或者戴在头上，会免去被枪炮击中。或者即使在战场上战死，如果带有“千人针”则能转世再生。日军侵华时，为了激发鼓舞士兵们的战斗热情，日本妇女们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赠送给士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感到剧烈地疼痛。他扔掉来复枪，抓着自己的肚子，想把那些内脏挤回到身体中去。“可恶！”他嚷道，“你做了什么？”

我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刀子已经掉在雪地上，我胡乱摸到一棵树靠在那里。那个士兵转身离开我，摇摇晃晃地朝森林里走去。他一只手紧抓着肚子，另一只手还拿着摄影机。他一步一摇，步履蹒跚，可他的头却往上昂着，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尊严，似乎他正走向某个重要的地方，走向树林之外某个更美好、更安全的地方。我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大约走了十码的时候他脚下被绊了一下，差点失去平衡。接着他喊出了一个词：一个女人的名字，可能是他妈妈的名字，也许是他妻子的。他举起胳膊，这个动作一定使他身体中的什么东西流淌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一种又暗又长的东西从他的伤口中淌出，滑落在雪地上。他失足踩在那东西上面，试图保持住平衡，可是现在他已经非常虚弱了，东倒西歪，意识模糊。他身后是一行长长的血迹，那血迹似乎并不代表死亡，而是预示着出生。

“给我。把摄影机给我。”

他已经无法回答了，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再也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彻底瘫软下来，双臂轻轻举起，又轻轻跌落。我迅速赶到他身旁。他的嘴唇青紫，牙齿上都是鲜血。“不，”声音轻得好像在叹息，可我已经把他戴手套的手指从摄影机上移开了。他的眼睛虽然已经看不到了，可却依然能感觉到我在哪里。他摩挲着我的脸，叹息道，“别拿走。你要是拿走了，谁来告诉世界？你要是拿走了，谁来告诉世界？”

这些话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会伴随我一生。谁来告诉？我久久地注视着居室外的天空，注视着飘过月亮的一缕黑烟。谁来告诉？答案是没有人。没人会告诉。一切都结束了。这将是我最后一篇日记，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写了。故事的剩余部分将会永远留在摄影机的胶片上，今天发生的一切将永远是个秘密。

# 1

东京，一九九〇年夏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咬着牙坚持。就算疲惫不堪、饥饿难耐，就算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不例外。那个夏天我在东京的感觉就是如此。那天我站在史重明教授的门前，心中焦虑，身上发抖。我把头发梳理得服服帖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整洁利落，还花了很长时间把那条旧的“乐施会”[①]发的裙子抻直，掸净上面的灰尘，用手掌把旅行时留下的褶皱抚平，然后又把被压扁的旅行箱踢到脚后，这样他第一眼就不会看到它，因为我知道给人留下一个正常可靠的印象是多么重要。我默默地数了二十五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深深吸了几口气，才终于有勇气开口讲话。

“有人吗？”我把脸伸到门口，试探着问了一句，“您在吗？”

我等了一会儿，竖起耳朵使劲听，虽然模模糊糊听到里面有走路的声音，但是没人过来开门。我又等了几分钟，怦怦的心跳声不断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终于敲了敲门。“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门开了，我惊讶地后退了一步。史重明站在门口，潇洒时尚，仪态端庄。他双手垂在身侧，仿佛等待检阅一般，身材却小到有些不可思议，像是个洋娃娃。他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雪白的头发垂到肩头，像是披了一件雪色披风。我张着嘴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把手掌放在大腿处，向我微微鞠躬。“下午好。”他的声音非常轻

① 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十三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

柔，英语非常纯正，几乎不带一点口音。“我是史重明教授，你是谁？”

“我，我是……”我顿了顿说，“我是学生，就算是吧。”我摩挲着把开襟毛衫的袖子卷上去，把手伸给他，希望他不会注意到被我咬过的手指。“我是从伦敦大学来的。”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我，把我苍白的面孔、柔软的头发、开襟毛衫和又大又笨、早已变形的行李箱都一一纳入眼帘。每个人第一次见到我时都会这么做，事实是，不管你装模作样的本事有多大，当你被迫让别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时，都会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一直想见到您，这种想法持续到现在有半辈子的时光了，”我说，“我等待这一时刻等了九年七个月零十八天。”

“九年七个月零十八天？”他扬了扬眉毛，很感兴趣的样子。“这么长？这样的话你最好快进来吧。”

我不太清楚别人会怎么想，但我却清楚地知道坐在一个人凝视的目光前，你能看到悲剧，真正的悲剧。如果你看得特别努力的话，你都差不多能看出那个人来自何方。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寻找史重明。他七十多岁，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不管他年龄几何，也不管他对日本人的感情怎样，他就在这里，在日本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办公室正好可以俯瞰大学射箭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黛色的大树环绕着层层叠叠的青瓦屋顶，传入耳膜的唯一声音则是乌鸦在常青的橡树间蹦来跳去时发出的鸣叫声。房间很闷热，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三台电扇呼呼地转来转去，搅得屋里灰尘飞扬。我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意识到我终于真的来到这里，心里不禁对自己萌生了些许敬意。

史重明把一堆堆的文件从椅子上挪开。“坐，坐，我去泡茶。”

我扑通一声坐下来，沉重的皮鞋像铁块一样碰在一起，我把包放在腿上，用胳膊紧紧抱住。史重明有些蹒跚地走来走去，从水槽那儿把热水壶灌满，却一不小心把水溅到他中国式的长衫上。风扇吹动了一捆一捆的文件纸张，也吹动了那些有年头的书籍。那些书摞在高高的、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看起来更加摇摇欲坠。在我跨入房间的瞬间，我就看到了放在角落里的放映机。这部 16 毫米放映机落满灰尘，放在高高

堆起的文件上面，因此恰好能够看到。我很想转过身仔细地看看，可我知道这不太好。我咬着嘴唇，双眼落在史重明身上。他正就他的研究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

“对于中医中药何时传入日本，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不过实际上你可以看看唐朝，你会发现那时就有中药在日本存在的证据。你知道吗？”他给我泡了茶，还不知从什么地方窸窸窣窣地掏出一包饼干。“高僧鉴真在十八世纪把中医中药传到日本，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到处都能看到汉医店铺。你只要走出校园就能看到。很有意思，是不是？”

我朝他眨了眨眼。“我以为您是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不是，不是。也许曾经是吧，可是一切都会变化。你想知道我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拿个显微镜，仔细研究一下生物工艺学家和社会学家相关联的领域……”他微笑起来，我窥见到他又长又黄的牙齿。“在那里你会找到我——史重明，一个有着堂皇的头衔实际上却非常渺小的男人。这个大学说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我感兴趣的只是所有这些有多少……”他猛然用手指着屋里的书、各色的动物标本，还有墙上挂着一张名为“湖南动物志”的大图表。“这些有多少是随着鉴真来到日本的，又有多少是在一九四五年被军队带回日本的。比如说，让我看看……”他的手在那些熟悉的图书上快速滑过，抽出一本落满灰尘的书放到我面前，翻到满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熊的图片的书页上。那些图片为了展示熊的内脏器官而把熊解剖开来，画家用明暗不同的粉色和绿色为解剖开的器官涂上颜色。“比如说这个亚洲黑熊，是不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他们才决定用轻井泽熊的熊胆治疗胃肠疾病？”他把手放在桌子上，凝视着我说，“我希望你就是为这个来的，是不是？黑熊就是我的兴趣之一。就是这个问题使许多人来到我这里。你是自然资源保护者吗？”

“不是，”连我自己都被声音里的坚定语气惊呆了，“真的，我不是。我并不是为这个而来。我从没听说过——轻井泽熊。”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身瞟了一眼角落里的放映机。“我……”我把眼光拽回来，再次注视着史重明，说，“我是说中医中药并不是我想谈的话题。”

“不是?”他放低了眼镜,十分好奇地看着我,“不是吗?”

“不是,”我认真地摇了摇头,“不是,根本不是。”

“那么……”他停顿了一下,“那你来这儿是因为……”

“因为南京。”

他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紧皱着眉头。“对不起,你刚才说你是谁?”

“我是伦敦大学的学生。至少,我曾经是。不过我学的不是中医。我研究的是战争暴行。”

“闭嘴。”他抬手阻止我往下说,“你找错人了,我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说着就站起来打算走掉,我却极迅速地把旅行箱拉开,从里面拽出一摞由塑料绳捆着的资料,因为太紧张还弄掉了一些。我捡起来把它们一股脑堆在我们俩面前的桌子上。

“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在中国的战争。”我解开塑料绳把笔记资料摊开。里面有我手写的蝇头小字,那是一些翻译稿,还有从图书馆的书中影印的材料证据,以及为了使我对发生的事情有更形象化的认识而画的一些草图。“特别是南京。看,”我拿起一张皱巴巴的、写满小字的纸说,“这是关于侵略的——日本指挥体系的系谱图,这都是用日语写的,看到了?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我用日语和中文都能写东西。”

史重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脸上流露出奇怪的表情。我做的草图和表格都不算太好,可是如果人们因为这个而嘲笑我,我却一点也不在乎——每一份资料对我都意义重大,每一份都能帮助我理清思路,每一份都提醒我正在一步步接近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发生的事实真相。“还有这个……”我打开一张草图,把它举起来。这是一张 A3 的纸,经过岁月的磨蚀,那些折叠处原本清晰的文字已经变得模糊。“这大致就是侵略结束后南京城的模样。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画完的。这边是成堆的尸体,看到了吗?”我抬起头,热切地看着他。“如果你愿意,现在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确切地说在这张画上有三十万具尸体,还有……”

史重明猛地站起来绕到桌子后面。他关上门，走到窗前，俯瞰着射箭馆，之后把百叶窗拉低。走路的时候他左脚微微有些跛。他的头发非常稀疏，看起来都有些秃顶，头上的皮肤全是褶皱，让人感觉他好像没有头骨，能一眼看到大脑的纹路与缝隙。“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提起南京人们有多么敏感吗？”他走回来坐在桌旁，他的动作非常缓慢，可能是因为有关节炎吧。他的身体朝我倾斜过来，低声对我耳语，“你知道在日本右翼的势力有多么大吗？你知道人们就因为谈论这个而会受到攻击吗？美国人——”他向我伸出颤抖的手指，仿佛我是美国最贴切的代表似的，“那些美国人，麦克阿瑟，使右翼分子完全变成了恐慌的制造者，今天的日本正是如此。所以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根本不能谈论这些事。”

我压低了声音，像他一样耳语道：“可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才见到你。”

“那你就转身回去吧，”他回答道，“你说的是我的过去，我不会在这儿，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谈论我过去的错误。”

“你误会了，我来是要你帮我。”

“帮你？”

“这是日本人做过的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几乎了解所有的暴行——杀人竞赛，还有强奸妇女。可我说的事情很特别，是你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没有人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大家都觉得我是杜撰的。”

史重明向前坐了坐，双眼直视着我。一般情况下，当我告诉人们我想要找到什么的时候，人们会忧虑又怜悯地看着我，那种眼神仿佛在说：“你肯定在杜撰吧。为什么编这种故事？为什么要编造这么可怕的事情？”可史重明的眼神完全不同，他的眼神锐利而愤怒。他说话时候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而痛苦：“你在说什么？”

“关于这件事有一份证据，多年前我读到过，可我后来就再也找不到那本书了，每个人都说我杜撰了这件事，并且说那本书根本就没存在过。不过没关系，因为我清楚还有一份胶卷，就是一九三七年在南京拍的。六个月前我找到关于胶卷的信息了。而你知道全部的情况。”

“荒唐。根本没有胶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是……可是你的名字就在那份学术杂志上。坦白地说，我看到了。那篇文章里说你曾在南京待过，还说你目睹了大屠杀，目睹了那种折磨。文章还说一九五七年你在江苏大学时，有人知道你有一份胶卷。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士兵们都做了什么。只要得到士兵们所作所为的一点细节，我就知道一切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还想知道他们把女人们带走时是不是——”

“对不起！”史重明猛地拍了拍桌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有没有同情心？这可不是喝着咖啡闲聊！”他从椅子后面抽出一根手杖，一跛一跛地走到门口，打开门，把门口的挂牌从挂钩上取下来。“看见没？”他说着，又用手杖把门关上。他举着挂牌给我看，为了让我看清楚还一个劲地敲打它。“社会学教授。社会学！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医。南京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没有胶卷。一切都结束了。好了，我很忙而且——”

“求你了。”我紧紧抓着桌角，脸涨得通红，“求你了。是有一份胶卷，真的有。我在杂志里见到过。马吉牧师[①]的影片里没有这件事的记录，可你有。这份胶卷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份了……”

“嘘，”他边说边朝我的方向挥舞着手杖，“够了。”他的牙齿又长又黄，就好像沙漠中被岁月打磨过的灰黄的化石——就是那种在稻米皮和山羊肉上打磨出来的黄色。“好了，我对你真的无比敬佩。我对你和你那独一无二的学院都敬佩有加。真是太有特色了。不过我还是要明确地告诉你：根本就没有胶卷。”

我想要努力证明自己并没有疯掉，可是像史重明这样的人对我真的毫无用处。原本是白纸黑字读到的东西，别人却在转眼间告诉你一切都是你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没错，就是这种事情会把你变得像他们说的那样疯狂。同样的故事又上演了，一切跟我十三岁时我和父母亲在医院发生的故事一模一样。那儿的每个人都说，那么残暴的事

① 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美国人，基督教圣公会牧师。日本侵华时曾拍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情肯定都是我凭空杜撰的，我是因为疯了才会胡思乱想——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恐怖和残忍的行径。日本兵的确很野蛮、很血腥，但他们也不可能做出那么凶残的事情，那些事太惨绝人寰，都让人难以启齿。那些觉得已经看惯了那个时代一切的医生护士们，在谈论这件事时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我肯定你相信自己是读过的。我肯定它对你来说全是真的。”

“就是真的，”我会说，低头看着地板，因为难堪而面色通红，“我的确读过。在一本书里。”那本书的封面是橘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张堆满尸体的照片。书里讲的全是南京发生的事情。在看到那本书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南京这个地方。“我是在父母的房子里找到那本书的。”

其中有个护士打心眼里不喜欢我，她经常在熄灯之后跑到我的床边来，因为她觉得那个时候没人能听到她讲话。那时我会直直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假装睡得很香。而她却什么都不理会，过来蹲在我的床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话，她的呼吸起伏而又热切。“我来告诉你吧，”她低声咕哝道，“你的想象简直恶心至极，我干这个倒霉工作十年了也没听过这么恶心的事。你真是个神经病。不光是有神经病，你还很邪恶。”在每个深夜，当窗帘上的花影静静地映在病房的天花板上的时候，她都会过来絮语一番。

可是我真的不是杜撰……

我很怕我的父母，尤其是我母亲，当医院里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本书的存在，当我开始担忧也许他们是对的，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当我开始害怕我真是个疯子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一摞一摞的书中帮我找一本橘红色封面的书，那本书的书名我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南京大屠杀》。

我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说：“我知道你相信的确存在着那样一本书，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的家里你从来没读过那么垃圾的东西。”

我母亲总是坚定地相信她能掌控我的所知所想。她不相信学校，认为学校会往我脑袋里灌输错误的东西，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家受教育。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担负这样的责任，如果你那么害怕（不管

是因为多么私密、多么痛苦的原因）你的孩子了解生命，那你就严格审查每一本能够在家里出现的书，有时候还需要把小说中那些不雅的书页撕掉，对吧？有件事你必须做到：那就是你得有始有终——至少要比我妈妈坚持得更久些。她没注意到松懈已经悄悄爬进了她的房间，穿过了野草丛生的窗子，溜过有些泛潮的成堆成堆的书籍。反正不知怎么回事，她没看住有关南京的这本书。

“我们上上下下都找遍了，竭尽最大的力气想帮助你，我们唯一的孩子。但是我很抱歉地说，在这件事上你错了。我们已经写信给你的主治医师，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还记得我把那封信扔到病房地板上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想法闪现在脑海里。我突然想，如果他们是对的呢？如果那本书根本不存在呢？如果一切真是我的胡思乱想呢？想到这里，我开始隐隐觉得胃里一阵阵剧痛，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糟糕、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有时候要证明自己需要漫长的努力。尽管有时你只是证明给自己看。

当我最终获准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了。我通过了教育机构的所有考试（几乎所有的考试我都获得了优秀成绩，这使每个人都很惊讶——他们的样子似乎在说，他们都认为无知就等于愚蠢）。到了外面真正的世界，对像我这样的人有相应的慈善措施，会有人帮助我们申请大学。他们带着我办好所有手续，我觉得办这些手续真是很费劲——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没完没了地坐公交。我已经自学过中文和日文，都是从图书馆借书学的，因此很快我就被伦敦大学的亚洲研究专业录取。突然之间我完全正常起来，至少在外面的世界没人认为我有神经病了：我租到了房子，还找了一份散发传单的兼职工作，有了学生通票，而且还有一位热衷于收集约鲁巴人的雕塑和前拉斐尔明信片的导师。（“我对脸色苍白的女士有迷恋情结，”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同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之后他又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当然，要不是疯子才行。”）不过，在学生们忙着规划毕业后的蓝图，或者准备考研的时候，我却整天想着南京。如果我这一辈子还想得到安

宁的话，就必须搞明白，我对那本橘红封面的书中的细节记忆是否准确。

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图书馆，在图书和期刊中仔细查询，试图再找到一本同样的书，或者，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找到有同样的目击证据的其他出版物。一九八〇年曾经出版过一部名为《恐怖的南京》的书，可那本书已经不再出版。所有的图书馆，就连国会图书馆都没有藏书，我甚至不知道这与我曾看到的是不是同一本。不过没关系，因为我发现了其他证据。这个发现令人惊喜异常——是一份关于那次大屠杀的电影胶片。

实际上共有两份胶卷。第一份是令人尊敬的马吉牧师的。马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中国传教，他的胶卷被同僚私运出去。那位同僚出于对周围局势的恐惧，把胶卷缝在驼绒外套的衬里中，偷偷把它带入上海。之后这份胶卷就被遗忘了，几年来一直被丢在南加利福尼亚一个闷热的地下室中，已经有些风化了，而且变得黏湿，甚至有些变形。胶卷再次发现后被送到国会图书馆的胶片中心。我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看到过复制的视频。我一遍又一遍仔细观看，眯起眼仔细研究，对每个画面都细细推敲过。这份胶片展现了南京发生的恐怖杀戮——那些事情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都不愿去想起——不过那份胶卷并没有展示我几年前读到过的暴虐与苦难。

第二份胶卷，只要是提及它，就必定会提及史重明这个名字。我听说有这份胶卷的那一刻，头脑一片空白。

那是我在大学的第二年。一个春天的早晨，罗素广场上游人如织，水仙盛开。我坐在图书馆人文学科书架后一张灯光昏暗的桌子旁，费劲地翻看一本褪色的杂志。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我终于找到了有关那场暴虐事件的资料了。说实话，这份资料并未直接提及那场暴虐事件，措辞有些模糊，而且缺乏关键性的细节。然而文章中有一句话却使我像弹簧一样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江苏有人提及有一份 16 毫米胶卷存在的事实，那份胶卷也记录了这种暴虐行径。与马吉的胶卷不同的是，时至今日，在国外还没有人发现这份胶卷。”

我抓紧那份杂志，把台灯拽过来照在那一页上，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文字。居然有一份影像资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太超乎想象了！他们可以说我有神经病，他们可以说我无知，但是谁也不能说这件事是我杜撰的——如果有这份白纸黑字的证据的话。

“据说这份胶卷属于一个叫史重明的人。他是江苏大学一位年轻的助教，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他一直在南京……”

我把这一段读了一遍又一遍，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曾经由于医护人员的不信任而被紧紧地包裹起来，严密地封锁起来。当邻座的同学由于不耐烦而大声叹气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一直站在那里，一会儿紧紧握拳，一会儿又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我手臂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在国外还没有人发现这份胶卷……

我当时真应该偷走那份杂志。如果我真的从医护人员的态度中接受教训，我就会把那份杂志塞进我的羊毛开衫中，然后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带着它走出图书馆。那样的话我就会用实物向史重明证明，这一切并不是我病态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也就不会否认这件事，我也不会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疯子了。

# 2

在厚重的、涂着亮丽红漆的东京大学赤门对面，有一座小小的咖啡屋，名叫“斑比咖啡”。史重明让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便顺从地把我那些资料收拾起来塞回到旅行箱里，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不过我并没有放弃。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走进咖啡屋，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正好能够看清楚每个进出赤门的人。

在我目所能及的上方，东京的摩天大楼闪烁着亮光刺进天空，阳光从数百万扇窗户中映射折回。我向前探着身子，凝视着眼前不可思议的景象。我对于这座凤凰涅槃般的美丽城市了解甚多，知道东京是如何在战争的灰烬中崛起的。可是在这里，在活生生的城市建筑中间，我却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真实。我在想，那个真正的战时的东京在哪里？那个蜂拥出无数士兵的城市在哪里？那个东京被埋葬在这个城市之下了吗？现实与许多年来盘桓在脑海中的黑暗形象真是有天壤之别，在我脑海中是被大火烧得黑乎乎的废墟，是被炸弹轰炸过的街道和黄包车——在我脑海中，有一个钢筋铁骨、轰鸣作响的意象作为东京的化身，那是存在于真实的东京之上的某种象征，是日本真正跳动的心脏。

女侍者一直盯着我看。我拿起菜单假装钻研起来，脸涨得通红。我根本就没有钱了，因为我从没考虑到这么远。为了买飞机票我曾在工厂里打包冻豆子，直干到手指头一层层脱皮。当我告诉学校，我想离开学校到这里来找史重明时，他们说再也无法忍受我了。我要么待在伦敦修完那些不及格的课程，要么就彻底离开学校。显而易见，我的心“已经不可救药地沉浸在发生于南京的一些事件中”。他们把我没有完成的学业模块指给我看：在法律系的核心课程中我从来就没有现过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